



英采林语

秦牧

上海文艺出版社

语 林 采 英

YULIN CAIYING

秦牧

上海文艺出版社

责任编辑：张有煌
封面设计：麦荣邦

语 林 采 英

秦 牧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

(上海绍兴路74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中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5.625 插页 精 5 平 2 字数 124,000

1983年8月第1版 1983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软精 1—6,000册 平装 1—105,000册

书号：10078·3385 定价：软精 1.20元 平装 0.68元

0387/14

目 次

文学是语言的艺术·····	1
表达意思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吗? ·····	6
各国作家锤炼语言的故事·····	11
热爱伟大祖国的美妙语言·····	18
在自己脑子里建立一座语言仓库·····	24
语言文字的传统势力·····	29
语言感受的灵敏度·····	35
“语言大街”上的一块绊脚石——艰涩·····	39
流畅自然的文笔·····	45
“语言大街”上的另一块绊脚石——含糊·····	51
描绘事物的清晰度·····	57
“语言大街”上的又一块绊脚石——罗嗦·····	62
谈简洁·····	65
饱满的形象·····	71
语言的宝库在当代人的口头上·····	77
古代词语的生命力·····	84
外来词的吸收和消化·····	88
珍贵的民族共同语·····	93
感情的火花和语言的喷泉·····	98

驯伏文字这头“野兽”	103
生活知识和丰富语言	111
中国气派和民族风格	116
掌握文学语言的音乐美	122
优美	128
独特的性格语言	134
譬喻——语言艺术之花	136
叠字、排句的艺术魅力	142
委婉语词和隐语	147
论警句	153
妙语如珠	158
标点符号——文章中的无声英雄	163
错字别字——书面语中的沙砾	168
后 记	174

文学是语言的艺术

人类,除了极少数的哑巴,人人都会说话。每个人自小都从父母亲和亲人那儿,学到了自己所属民族的语言——也就是所谓“父母语”。学会了讲话之后,人和人之间,互相交流思想感情,多么方便啊!列宁说:“语言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斯大林说:“语言是手段、工具,人们利用它来彼此交际,交流思想,达到互相了解。”这些话说得真对!

一般动物有语言吗?如果是最简单的“传达讯息”,动物自然也会的。动物学家研究出黑猩猩在见到食物,面临危险,发情,饥饿,愤怒,悲伤的时候,都各各会发出互不相同的音节来。猎兽、捕鸟的人,仿效某些鸟兽的叫声,能把它们引到跟前,加以捕捉。可见不少动物,是有它们“传达讯息”的本能的。但是各种动物发出的声音都很简单,而且大抵是单音节,无非是作为觅食,引类,寻偶,警戒的信号而已。象人类这样能够表达复杂意思(试想人们得拥有多么丰富的词汇才能够完成这样的表达!)的语言,动物是不可能有的。鹦鹉能够仿效人类讲话,但是它们不过是机械地模仿,那些话语所包含的意思,鹦鹉原本是莫名其妙的,不知所云的。

如果没有这些共通的语言,人和人之间相处该是多么困难呀!北京曾经发生过这么一件事情:一个外国人想坐汽车去烤

鸭店吃烤鸭，那时刚好没有翻译在场，他自己找到了司机。但是那个外国人不懂中国话，这个司机又不懂外国话，他们彼此谈了半天，都弄不清对方的意思。外国人着急了，就平伸两手，作鸭子走路的姿势给司机看，比划了好一阵子，司机点头表示明白了。但是，汽车一开竟把外国人送到郊外的飞机场！原来司机把外国人仿效鸭子走路的动作误当作是学飞机在跑道上滑行了！从这么一个小故事，我们也可以想见：要是人们没有共通的语言，没有这种彼此都能了解的“最重要的交际工具”，生活在一起该多么困难！

幸好，我们各个民族的祖先在百数十万年的进化和劳动过程中，逐步创造了相当完善的语言。这是着实值得我们感谢的。但我们不是感谢某一个人，而是感谢我们民族的无数代的祖先。我们可以想象：在几十万年以前，人类的祖先也是只能咿咿唔唔地讲着单音节的言语的，情形大概也和黑猩猩差不多。但是，由于劳动需要协同行动，交流经验，语言就逐渐发展起来。正象劳动创造了人一样，劳动也使人类发展了语言。有了比较丰富、严密的语言，人类在和自然斗争和交流经验当中就有了更大的便利。高尔基认为：“劳动、火和语言是帮助人类创造文化——第二自然的力量。”这是很有道理的。

有了比较丰富的语言，即使在还没有文字的时候，各个部族已经开始出现了原始的农学家、畜牧家、历史家和文学家。自然，这些人都不认得字，因为那时根本没有文字。那些能够把积累起来的耕种经验、畜牧经验告诉旁人的就是原始的农学家、畜牧家了；那些能够把祖先的事迹，或者叙述几个简单的故事告诉人们的，就是原始的历史家和文学家了。不识字的人也能成为这种种专家么？能够的。现在世界上还有一些没有文字的民

族，他们也各各拥有这些专家。不然，他们的生产经验就没法一代代传播下来了；丰收之际，月光之下，他们载歌载舞以后，就没有人给他们追溯民族起源和讲述有趣故事了。

文字的逐步创造和发展，使人类的文化活动跨进了一大步。文字也是经历过悠长年代，由许许多多的人，集体创造出来的。这个道理，我们只要从两千多年来，各个朝代，字典性质的书籍所搜罗的字数，分明是逐渐增加的这一点，就可以充分体会了。但是古代许多人不了解这个道理，以为文字是太古时代一个人独力创造出来的，汉族的先人曾经把它归功于一个叫做仓颉的人，并且由于对文字记载事物、传播思想卓越功能的倾倒，还穿凿附会地捏造起这样的神话来：仓颉是有四只眼睛的人物，并且造字的时候，吓得群鬼夜哭，老天也降下粟粒来。这自然是无稽之谈。但是，从这样的神话传说的产生，倒也错综曲折地显示了文字的出现对于人类进步关系的重大，在先民们看来，这真是惊天动地的事情了。

事实上文字是由许多的人，经历过好些年代，才逐渐创造出较为完备的一批的。鲁迅说得好：“但在社会里，仓颉也不止一个，有的在刀柄上刻一点图，有的在门户上画一些画，心心相印，口口相传，文字就多起来，史官一采集，便可以敷衍记事了。中国文字的由来，恐怕也逃不出这例子的。”

语言和文字不断在变化、发展着，到了后来，人们可以用文字表达极其错综复杂的意思了，学术巨著也有了，文学名作也有了。书籍出版之多简直成了书海，但是在林林总总、种类纷繁的书籍中，我们却可以大体把它们分成哲学、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文学艺术等几大门类。所有的书籍，都是通过文字把语言记录下来的。但是我们如果细加分析，就可以发现，在这里面，最需

要讲究语言功夫,使描绘的事物维妙维肖,活龙活现,形象生动,栩栩传神,不但启发人们的思想,并且激动读者感情的,就是文学。这只要看外国有人统计的结果就可以明白了:文学名著中使用的不同单词,比哲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著作中使用的,要丰富得多(拼音文字的单词常常有好几十万)。研究各个领域事物规律性的著作,它们可能在局部的地方,也作形象的描绘,但是就其根本性质来说,特点在于作理论的分析,并不象文学那样,要运用语言塑造艺术的形象,因此,也就不象文学那样,格外讲究语言的功夫。

有人把修辞的手法,归纳为两大类。这就是“消极修辞”和“积极修辞”。“消极修辞”,只要把话说得明确、通顺、平匀、稳密就行了;“积极修辞”,除了也要求具备这些条件以外,还要求积极地随情应景,运用各种表现手法,极尽语言文字的一切可能性,使所说所写的事物呈现出具体形象,产生新鲜活泼的动人力量。文学不象科学、法令、布告那样,运用“消极修辞”的手法就可以达到目的,它得运用“积极修辞”的手法。因此,当然得格外讲究语言的功夫。

不仅文学,艺术许多部门都讲究形象,使人产生可触可摸的立体印象,并从而接受蕴藏于其中的思想感情的影响。绘画、雕塑、音乐、舞蹈、文学、戏剧、电影都讲究形象。不过,绘画、雕塑,是用色彩、线条构成艺术形象,音乐、舞蹈是用音响、节奏或人体动作构成艺术形象,文学是用语言塑造艺术形象,戏剧、电影则是用造型、表演、语言等等手段综合起来塑造艺术形象。因此,艺术虽然都讲究形象,但是各个部门使用的手段是各不相同或者不尽相同的。

这样看来,讲究怎样运用语言来描绘事物,不用说是文学的

重大课题。高尔基说：“文学创作的技巧，首先在于研究语言，因为语言是一切著作、特别是文学作品的基本材料。”这话是说得很有到家的。

每一种学问，不深入研究下去则已，一深入研究下去，可以说都是博大深邃的。一只动物是这样，一片金属是这样，一粒原子也是这样。文学表现本领，语言艺术运用的问题，不待说，同样是非常博大深邃的学问。在这本小书里，我尝试根据自己的学习心得和点滴经验，从语言宫殿的大门旁边，探首望一望它广阔宏伟的景象。

表达意思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吗？

表达意思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吗？

它既容易，又不容易。

表面上看来，只要不是哑巴，谁都会说话，语言又是全民的交际工具，人们从“牙牙学语”的时候起，就从母亲和其他亲人那里，学习到一定范围的语言，进入社会以后，又扩大了这个学习范围。表达意思，还有什么困难呢？

但是，事实并不尽然。虽然“我要吃饭。”“他在工作。”“要走多少路？”“这是什么？”等等一大批语言，是大家都会说的。但是，碰到一桩复杂的事件，一种罕见的现象，或者想描绘一种错综的心理，一番微妙的感情，状物写照和表情达意就不是那么容易了。

我们和人家谈话的时候，有时会听到这样的语言：“哎，我不会讲话，讲不来。”“我心内的这个意思，不知道怎么说才好。”一个讲话含混不清、拖泥带水的人叙述了一件事情之后，有时我们也会听到人们这样的议论：“他讲了什么呀？怎么我听起来不清不楚。”

可见，表情达意，有时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书面语虽然是以口头语为基础的，但毕竟不完全等同于口头语，它要求语言更有条理、准确、清晰、简明。如果是文学作

品，那么要求就会更高，还要求生动、形象、优美、音调和谐，等等。因此，尽管有些人平时讲话娓娓动听，但写起文章来却没有那种流畅的风味了。

十九世纪的时候，俄国有一个叫做纳德松的诗人，讲过一句很奇特的话：

“世上没有比语言的痛苦更强烈的痛苦。”

这句古怪的话，含义是：人在意思无法恰当表达出来时的痛苦，是难以形容的。这句话有相当道理。某些哑巴在无法把意思表达出来的时候，有气得把内衣撕破，乱抓着胸膛的。在革命高潮的时候，当一席演讲、一篇檄文、一句口号真正道出了群众的心声，我们也会看到：它时常立刻引起群众强烈的共鸣，引起雷动的欢呼。

“世上没有比语言的痛苦更强烈的痛苦。”这句话，甚至曾经引起初学写作时代的高尔基的同感。后来，苏联的国家出版社还刊行过一本书名就叫做《语言的痛苦》的书，专门阐述怎样克服表情达意的困难，和掌握、运用文学语言的问题。

如果有人不相信表情达意有时也会出现困难的话，就让我举几个小例子让大家瞧瞧吧。

前几年，在我们单位附近有一个机关，是负责清理城市的垃圾和粪溺的，它大概是卫生局的一个什么“处”罢。在一两年之间，我上班的时候，好几次看到它换了招牌。一下子叫做“城市粪溺管理处”，一下子又叫做“城市污物管理处”，改来改去，最后才改定为“广州市环境卫生管理处”。试想一下，要找几个字来比较贴切、文雅地作为一个机关的名称，竟有这么困难，要折腾一两年才真正找到一句恰当的言语！

又如：广州有一间著名的菜馆，是专门出售蛇肉做成的肴馔

的。从前它叫做“蛇王满饭店”(大概原本是一个专门捉蛇,叫做阿满,有“蛇王满”之称的人创办的),十年动乱期间,改街名、铺名、人名、商品名成风,它又被改名“卫东饭店”(顾名思义,读者可以知道它想表现的是什么意思),后来,它又再改名“蛇餐馆”。这个名字令人看了不禁发笑。因为卖蛇肉的馆子,可以叫做“蛇餐馆”,那么,依此类推,卖猪肉、狗肉的馆子,不是应该叫做“猪餐馆”“狗餐馆”吗!这样的酒家名称,应该说是对于顾客的作弄和戏谑(自然,命名的人原本并无这样的用心,但是,客观的效果却是如此)。如果它叫做“蛇肉馆”或者“蛇肉酒家”,不是要文雅和贴切一些吗?但是,这间“蛇餐馆”的牌子,至今赫然高悬,并没改动。从这样的事,也可见,即使是一语之微,有时从错误到纠正,也要经过一番历程。

有一次,在广州举办交易会期间,我在街上看到一队华贵的客车,鱼贯行驶,每一辆车的玻璃窗上,各贴有一方纸张,上面写着“纺织”、“石油”、“化工”等等字眼,不用说,车上载的都是前来参加纺织品、石油产品、化工原料产品交易的客人。但是,接着来了一辆车,纸上写的竟是“土畜”,我看了,不禁悚然一震,又吃惊又好笑。它大概是代表土产畜产进出口公司吧,不过,在载人的客车上,怎么能够高标“土畜”这样的字眼呢!显然,这样的用词,也是十分不妥的。

这里举的,都是一些一言半语失当的例子,但是,从这些例子,不是可以见到,贴切、清晰地表情达意,有时确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吗!

实际上,不仅从事文学工作,必须十分注重语言的学习和运用,如果单是从用语贴切恰当这个角度来看,各个领域的工作者,也都得具有一定的语言、文字水平才好。

革命导师们对于精确地运用语言都十分重视。马克思、恩格斯对于自己的手稿，总是一改再改，使得文字在描述事物、剖析道理时达到非常缜密精确的境界。马克思对于一些人所写的草率含糊的文字很反感，常常对他们作了十分严格的批评。

例如，当巴黎公社被反动派扼杀于血泊中之后，有一个叫做利沙加勒的新闻记者写了一本题作《一八七一年公社史》的书，马克思对这本书颇加推许，认为它保存了法国那场伟大革命运动的许多珍贵史料，大有出版价值。马克思除了帮助作者出版外，还找到一位叫做库尔茨的小姐把它译成德文，准备在法文版外，再出德文版。这位库尔茨小姐本来有相当水平，但翻译时常常粗心大意，马虎从事，结果在译文中就出现了许多错误和措词不当的地方。例如：她把“默契”一词译成“无言的委托”，把“追求议员席位的资产阶级阴谋家”译成“追赶代表团的”，把“这个时代”译成“这个时刻”。马克思在写给友人的信中间接批评她道：“正如一条线不是空间的一点一样，一个时代并不是一个时间上的一刻。”马克思还在另一些书信中很严肃地批评这位小姐道：“这完全是粗心大意造成的！”“显然她又犯了令人无法原谅的粗心大意的错误。”“大体说来，在不是根本译错的地方，译文往往是拙劣的，庸俗的和枯燥无味的。”那部《一八七一年公社史》，有中文译本，如果读者找来看一看它的附录，就可以读到马克思这些显得十分恼火的，对于运用语言粗心大意的人严厉的批评了。

社会科学工作者、自然科学工作者，有许多人对于精确地运用语言都十分重视，因为如果不是这样，他们写出来的东西，就无法缜密、准确地表现事物和陈述思想了。科学家中，许多人的文笔都相当高明，象达尔文，赫胥黎，法拉第，富兰克林，法布尔，

爱因斯坦等人就都是这样。中国著名科学家中语言功夫十分到家的也大有人在。我觉得他们的语文水平，甚至还超过某些平庸的作家。

近代电学研究先驱者富兰克林，少年时代在印刷厂当学徒的时候，就非常重视学习语文。有一次，他和好朋友约翰争论一个问题，书信往还，互相辩难。一天，他正在寄信的时候，他的父亲把他们来往的信件都拿来看，读完之后，就提出意见：“你的信在正字和标点方面胜过约翰，这得归功于你在印刷所的学习，但是在措词优美、条理清晰等方面，你就远不如对方了。”接着，指着双方书信，举出了几个例子。富兰克林不住点头，此后，就更加注意改进文风。他有时读到一篇好文章，常常把每一段的论点作了摘要。过了几天，富兰克林不看原书，只对着笔记本子上的论点提要，用自己的语言把那些道理阐述出来，然后又对照原文，比较彼此的优劣，改掉自己的缺点。时间一久，他不但在写作上大有进步，甚至还能发现某些原文的条理和语言的不足之处了。

一般来说，有关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的文章，在语言运用上能够做到准确、清晰、流畅、条理分明就够了，文学在语言运用上，比这个要求更高（正因为这样，有人统计过，文学名著中使用的不同的字眼，数量总是要比一般科学著作多得多），它还得讲究新鲜、形象、文采、音响、个性语言等等。如果从事文学的人只满足于文字通顺，或者以为有了思想，有了生活素材，就大路朝天，法力无边，视文字为等闲之事，不在语言文字上下苦功夫，怎么能够写出精采的文学作品来呢！

各国作家锤炼语言的故事

有人写了各式各样的关于作家们的故事，但是，可惜没有人写一本谈论各国作家学习语言的故事专集，如果有，那将是一部很精采而且很巨大的书。因为各国作家，那些比较优秀和成熟的，总是得在语言的雄关之前，经过一番苦战，打退了“艰涩”“贫乏”“粗疏”“单调”“繁冗”“平板”等等拦路“强人”，杀出关去，才能够跨上阳关大道，进入荡荡平川。那些杀不退拦路“强人”的，就栽个筋斗，翻下马来，困死在“语言关”前，或者拨马转身，落荒而逃。

这里写的自然是一个借助于形象的比喻。它无非想说明：几乎所有比较成熟的作家，都非得在学习、锤炼语言上痛下功夫不可，不然，就不可能在文学创作上取得成就。所不同的，只是有些人的事迹为人们所熟知，广泛流传，有些人对自己的努力保持缄默，因而人们不大知道罢了。

我国历代著名作家中，艰苦学习语言的故事非常之多。以诗歌通俗、精采著称的白居易，不但经常和老婆婆们谈话，摄取口语入诗，还经常把自己的诗读给不识字的老婆婆听，问她们听懂没有，听得懂的，就誊录下来；听不懂的，就加以修改。由于经常吟咏，他有时甚至把嘴唇皮也磨破了，生了口疮。苏东坡也是每到一个地方，总是访问父老，和各方面的人物广泛接触，听人

聊家常，谈掌故；从这些交往活动和勤奋学习中丰富自己的写作材料，提高自己的语言艺术。

唐代的李贺经常背着个破旧的锦囊，骑驴出门，听人谈话，观赏风景，吟诵诗句，随时把想到的好句子记在纸条上，投入锦囊中；回家后再在油灯下逐条整理，作为精心构思完整诗篇的材料。和这相映成趣的，是宋代的诗人梅尧臣，外出游玩和访亲会友时，总是随身带着一个号称“诗袋”的布袋，见到什么新鲜的事情或美丽的风景，吟咏得句或成诗的时候，就把写好的投入袋中。

王安石写过一首题名《泊船瓜洲》的诗：“京口瓜洲一水间，钟山只隔数重山。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第三句那个“绿”字，使全诗增色不少。而这个字眼，并非妙手偶得，而是经过再三吟哦，选用过“到”“过”“入”“满”等字，都觉得不够理想，一想再想，最后才选定的。在中国，这个故事和“推敲”的故事，“一字师”（旧时代好些人认为对于能够改动自己诗文中的一字，使句子贴切精采起来的人，就值得拜之为师）的故事等等，向来为历代文学界的人物所津津乐道。

从小注意各种各样人物的性格语言，后来写成了辉煌巨著的曹雪芹；在大路旁摆着茶烟，供过路人享用，并请他们各各讲一则鬼魅狐妖的故事（大抵是借以讽喻现实生活之作），后来写成了名作《聊斋志异》的蒲松龄，他们的事迹，同样为广大人们所熟知。

在俄国，普希金，屠格涅夫，列夫·托尔斯泰，契诃夫，高尔基这些作家，辛勤学习语言，锤炼语言的故事，是广泛为人们所传诵的。

普希金从小就向奶妈学习语言，常到附近市集去，听瞎子们